

# 习惯形成、不确定性与农村家庭高储蓄率

——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研究

贾男, 张亮亮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摘要:** 本文回顾了习惯形成假说理论的基本思想, 并从习惯形成理论的角度出发, 首次利用中国的农村家庭微观面板数据对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试图给出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持续偏高、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一个解释。实证结果显示, 户主的一些人口特征变量显著影响农村居民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 中国的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消费不存在习惯, 在非耐用品消费上表现出一定的习惯, 习惯形成是导致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不振及高储蓄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 农村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关键词:** 农村居民; 高储蓄率; 消费倾向; 习惯形成

**中图分类号:** F830.48 **文献标识码:** A

## 一、引言

中国长期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及政策制定部门共同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从家庭部门储蓄来看<sup>1</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银行储蓄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而且储蓄率始终在高位运行(袁志刚等, 2005)。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7119.8亿元人民币, 1992年一举突破万亿大关, 1998-2002年的4年间,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率达62.7%, 平均每年递增17.1%; 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7%, 二者相差9.4个百分点, 储蓄存款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2003年超过10万亿, 到2006年底, 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61587亿元, 如果把债券和股票等计算在内, 居民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更高(施建淮、朱海婷2004; 周绍杰2009)。

在居民部门的储蓄持续超常增长的背后, 是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长期呈下降趋势。同时, 就收入的可比水平而言, 中国农村家庭用于储蓄的比率高于城市家庭, 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刘建国, 199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89年为0.89, 2006年则下降到0.78。显然, 相对于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总量, 我国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偏高、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现象极不相称。尤其是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化解和国内经济结构面临重大调整的情形下, 如何扩大内需, 降低储蓄率, 提高我国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更加成为政策当局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关于中国长期以来异乎寻常的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国内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大量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解释因素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抚养系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1999)、人口结构变化(蔡昉,2004;周绍杰,2009;汪伟,2009)、收入分配不均(刘文斌,2000;朱国林、范建勇、严燕,2002)等,此外,许多研究从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制度缺失等角度寻求合理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预防性储蓄理论(龙志和、周浩明,2000;朱春燕、臧旭恒,2001;施建淮、朱海婷,2004;刘兆博、马树才,2007;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2008)和流动性约束理论(叶海云,2000;万广华、张茵、牛建高,2001;赵霞、刘彦平,2006;高梦滔、毕岚岚、师慧丽,2008)。这两种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高储蓄率,也从现实中找到了证据支撑。然而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各种刺激内需政策的出台,高储蓄率的现实并未发生明显改善,这说明还存在着其他导致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就是其中之一。

“习惯形成”理论认为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习惯存量”(Habit Stock)。在给定的当前支出水平下,习惯存量越大、效用越低,消费者得到的满足不再来自于他的全部消费,而仅仅来自超过他的习惯存量所需要的额外消费,习惯形成下的消费行为更为谨慎从而导致消费推迟(Deaton,1992)。在持久收入面临冲击时,习惯形成使得消费者对于消费的调整更缓慢,而且习惯形成本身也会引起除预防性储蓄以外的储蓄(seekin,1999),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习惯形成提供了进一步消费的动机,消费者希望消费水平只升不降。习惯越强,从给定的消费水平中得到的效用越低,为获得相同的效用需要的支出就越大;另一方面,预期到这个,一个具有时间不可分偏好的理性消费者为了保证当期消费始终大于习惯存量,势必要适当降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习惯形成参数越大,消费者便越谨慎,积累的储蓄就越多。事实上,消费习惯意味着消费者不仅关心其消费水平而且关心消费增长率,在一个正的收入冲击以后,消费者将缓慢调整其消费水平,因为一个迅速的调整将创造一个影响未来效用的习惯存量。因此,一个正的收入冲击意味着一个缓慢的消费反应和更高的储蓄。从而,习惯形成假说可以解释中国居民储蓄的增长率为什么一直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率。

习惯因素首先被 Pollak 和 Wales(1969)引入完整的需求系统,之后 Polak(1970)在线性支出系统(LES)中,Howe,Pollak 和 Wales(1979)在二次支出系统(QES)中,Blanciforte 和 Green(1983)在近乎理想的需求系统(AIDS)中分别开始考察习惯对消费者需求行为的影响。

80年代以后出现的许多“习惯形成”的实证检验从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导出习惯形成参数,由于数据限制,大多数研究采用总量数据,如(Muellbauer(1988)<sup>[8]</sup>; Person 和 Constantinides,1991; Heaton,1993等)。然而,总量数据中无法控制的非观测异质性可能会夸大习惯效应(Heien 和 Durham,1991)。因此90年代以后,随着微观数据的逐步积累,经济学家们开始采用家庭数据对习惯形成进行实证研究,仅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Heien 和 Durham(1991)是首位运用微观数据(CEX)对消费习惯进行研究的学者,此后 Meghir 和 Weber(1996)利用美国 CEX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数据,Naik 和 Moore(1996),Dynan(2000)利

用美国 PSID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数据, Guariglia 和 Rossi (2002) 利用英国 BHPS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数据, Carrasco et al (2005)、Browning 和 Collado (2007) 利用西班牙 ECPF (the Spanish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数据, Alessie 和 Teppa (2009) 利用荷兰 DHS (the DNB Household Survey) 数据, 都对个人食品消费进行了检验。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越来越关注消费习惯形成问题。龙志和、王晓辉、孙艳 (2002) 使用某省会城市 50 户家庭的分月家计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食品消费习惯进行了检验, 得出滞后消费系数为 0.35, 认为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在食品消费上具有显著的作用。艾春荣、汪伟 (2008) 运用 1995-2005 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检验表明城镇及农村居民的总消费都具有耐久性, 在非耐用消费支出上农村居民表现出一定的习惯, 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几乎不存在。杭斌 (2008, 2009a, 2009b)、雷钦礼 (2009) 考察了习惯形成下的预防性储蓄, 利用各省城镇及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都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 这一特征是影响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龙志和 (2002) 虽然采用了微观数据进行研究, 但是样本量太小, 并且没有对模型的内生性进行控制。国内大多数有关习惯形成的研究采用总量数据, 然而, “代表性消费者” 概念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一是代表性消费者知道的太多, 消费者信息完全与同质的假定在现实中不能成立; 二是代表性消费者具有无限生命; 三是在加总数据的过程中需要很多不切实际的假定 (Deaton, 1992)。总量数据不能控制个体之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 因此会造成估计结果是有偏的。基于这些原因, 尽管习惯形成假说在中国已有宏观数据的初步证据, 但要进一步验证这个假说需要从和理论基础相匹配的微观数据入手。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 采用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面板数据, 对习惯形成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以期从这一角度对居民高储蓄率作出解释。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 第二节说明经验模型和估计方法; 第三节是数据描述和变量说明; 第四节是实证检验的结果; 第五节是结论。

## 二、经验模型和估计方法

本文的经验模型建立在 Naik 和 Moore (1996) 的习惯形成模型基础之上。消费习惯形成理论认为个人  $i$  在  $t$  期的效用函数为  $u(c_{it}, x_{it})$ , 取决于当前消费  $c_{it}$  和习惯水平  $x_{it}$ ; 并且只有消费水平超过习惯水平 (即  $c_{it} - x_{it} > 0$ ) 时才会产生正的效用。设个人在时期  $t$  的习惯水平如下:

$$x_{it} = x_{i0}e^{-a_i t} + b_i \int_0^t e^{-a_i(s-t)} c_{is} ds \quad (1)$$

这里  $c_{is}$  表示个人  $i$  在  $s$  时期的消费;  $x_{i0}$  为初始条件;  $a_i, b_i$  为表示个体效应的常数,  $a_i$  越大, 给予过去消费的权重越小。从 (1) 式可以看到消费水平由两部分组成: 固化的消费习惯水平  $x_{i0}$

和可变习惯水平  $x_{it} = \int_0^t e^{a_i(s-t)} c_{is} ds$ ，即由过去某个时期的消费所形成的习惯水平。

包含习惯因素时，代表性个人  $i$  的即期效用函数的形式如下：

$$u(c_{it}, x_{it}) = \frac{(c_{it} - x_{it})^{\gamma_i}}{\gamma_i}$$

$\gamma_i$  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给定消费投资策略和约束条件，Constantinides (1990) 证明了存在唯一的预算内最优消费：

$$c_{it}^* = x_{it} + h_i \left[ w_{it} - \frac{x_{it}}{r + a_i - b_i} \right] \quad (2)$$

其中  $h_i$  是一个关于无风险资产回报率、时间贴现因子、股票市场回报和回报方差的函数。

$w_{it}$  表示个人在  $t$  期的财富预期，它包括人力财富和实物财富。

(1) 式所给出的  $x_{it}$  的一般形式过于复杂，为了便于实证分析，假定习惯水平的简化形式：

$$x_{it} = \eta_{i0} + \eta_{i1} c_{it-1} \quad (3)$$

即个人的消费习惯水平仅受滞后一期的消费的影响。由 (2) 式可知，个人最优消费是消费习惯水平  $x_{it}$  和财富的函数。将 (3) 式代入 (2) 式，可得个人消费为：

$$c_{it} = \alpha_{i0} + \alpha_{i1} w_{it} + \alpha_{i2} c_{it-1} + \alpha_{i3} \sigma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alpha_{i0} = \eta_{i0} (1 - \phi_i)$ ， $\alpha_{i1} = h_i$ ， $\alpha_{i2} = \eta_{i1} (1 - \phi_i)$ ， $\phi_i = 1 - h_i / (r + a_i - b_i)$ 。 $\sigma_{it}$  为不确定性，Alessie 和 Lusardi (1997) 在常绝对风险厌恶效应函数 (CARA) 假设下推导出的消费的封闭解与此形式类似。

由于本文感兴趣的是家庭的消费习惯及不确定性  $\sigma_{it}$ ，因此对 (4) 式中的消费和财富取对数，并加入人口学特征等必要的控制变量，将 (4) 式改写为如下经验模型：

$$\ln c_{it} = \alpha_{i0} + \alpha_{i1} \ln w_{it} + \alpha_{i2} \ln c_{it-1} + \alpha_{i3} \sigma_{it} + X\beta_i + e_{it} \quad (5)$$

其中， $i$  表示家庭， $X$  是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家庭的收入、利率、家庭的规模以及户主的人口学信息，如户主的性别、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对于非耐用品消费而言，当  $\alpha_{i2} > 0$  时，表示存在习惯形成，这意味着前期消费越多，当期消费也要越多效用才能增加；对于耐用品消费而言，当  $\alpha_{i2} < 0$  时则意味着存在消费习惯，前期消费越多，当期消费越少，其实质是表示耐用品存在着耐用性。

注意到(5)式中,消费水平受到上一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该式实质上是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于该模型的估计,Naik和Moore(1996)建议用固定效应估计,他们认为固定效应可以很好地剔除个体的异质性以及一期滞后消费所未能捕捉到的历史消费特征所带来的影响,而个体的异质特征对于解释消费习惯至关重要。

然而,如果应用固定效应来估计模型(5)仍然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固定效应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在有限样本中是有偏的(Green, 1996);其次,虽然固定效应可以控制个体之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模型内生性问题,因为某些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如消费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当期和前一期的消费支出。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建议两种解决方法:第一,运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同时估计,用滞后二期、滞后三期的消费支出 $c_{it-2}$ 、 $c_{it-3}$ 作为工具变量,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的不确定性 $\sigma_{it-1}$ 、 $\sigma_{it-2}$ 作为 $\sigma_{it}$ 的工具变量,因为 $c_{it-2}$ 、 $c_{it-3}$ 与 $c_{it-1}$ 高度相关, $\sigma_{it-1}$ 、 $\sigma_{it-2}$ 与 $\sigma_{it}$ 高度相关,但均与 $e_{it}$ 不相关。从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本文样本进行Hausman检验的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2SLS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发现我们的确不能忽略 $c_{it-1}$ 和 $\sigma_{it}$ 的内生性。 $c_{it-2}$ 、 $c_{it-3}$ 、 $\sigma_{it-1}$ 、 $\sigma_{it-2}$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weak IV)的问题,sargan检验表明工具体是有效的;第二,Green(1996)指出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不仅能纠正固定效应对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的有偏性,还能在有效性方面得到改进。因此,本文将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对模型(5)进行估计,对比其结果,并相互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

### 三、数据和变量说明

####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卡罗来纳人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在中国联合进行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样本包括了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等东、中、西部9个省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数据。CHNS项目用于检验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健康、营养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以期了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人口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CHNS中1989年、1991年和1993年包括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和山东8个省(自治区);1997年由黑龙江替代了辽宁,其他省(自治区)不变;2000年及2004年的数据包括黑龙江和辽宁在内全部9个省(自治区)。

本文的样本是农村家庭,共2573户,总计18811个观测值。分析中,实际采用的样本数在各个回归中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分析的过程中参与活动的不同与相关变量缺失值的多少。

## (二) 变量说明

1. **消费支出  $c_{it}$** ：消费支出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两种衡量指标，家庭总消费支出、食品支出。

其中，食品作为非耐用消费品的代表，在文献中被广泛应用，如 Naik 和 Moore(1996)、Dynan(2000)、Guariglia 和 Rossi(2002)、Carrasco et al(2005)、Alessie 和 Teppa(2009)等。然而，类似的研究在中国却鲜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缺乏家庭食品消费的直接数据，本文利用 CHNS 中的家庭三天总食品实际消费量以及社区水平的食品价格数据，计算出家庭的食品消费金额。这一工作十分繁琐和花费时间，因为需要依据数百种食品的代码将数量与价格进行匹配，这也是本文最大的贡献之一。具体而言，我们从 CHNS 社区调查的数百种食品中选取了八大类共 36 种食品作为日常食品的代表<sup>2</sup>，由于 2000 年前后的调查采用的食品代码不同，先将所消费食品的代码分别在 1991 版《食物成分表》(全国代表值)和《中国食物成分表 2002》中查出，然后依据食品代码将消费量与价格进行匹配，二者相乘得到食品消费支出金额。

以上各类支出均取对数，并以 2006 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2. **不确定性  $\sigma_{it}$** ：关于不确定性的度量，袁志刚、宋铮(1999)采用基尼系数，孙凤(2001、2002)采用收入的方差，万广华、张茵、牛建高(2001)采用收入增长的预测误差值的平方作为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本文借鉴田岗(2004)的做法，以收入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的比率来作为衡量不确定性的指标。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假定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建立在其拥有消费的历史信息并且风险厌恶的基础上，即不确定性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一般要降低居民的消费效用，为了维持既定的效用水平，农村居民会根据收入增长状况来适当地决定消费的增量。这一比值越高，证明居民收入的增长中用于消费增长的越少，消费行为越谨慎，越体现他对风险的规避。

3. **家庭的财富  $w_{it}$** ： $w_{it}$  是家庭财富预期的代理变量，由于预期值不可得，在估计时采用前一期的实际家庭总财产代替。我们以房产和家庭用具<sup>3</sup>的价值总和来衡量家庭的总财产。家庭总财产仍以 2006 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4. **家庭的收入**：收入的衡量采用 CHNS 于 2007 年发布的家庭净收入数据，取对数并以 2006 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图 1 是在样本期内，农村家庭平均收入和平均消费支出的变化趋势。

5. **实际利率**：7 天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加权平均利率(CHIBOR)应该是体现中国市场利率最理想的指标，但由于 CHIBOR 在 1997 年以前尚未建立，本文采用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作为市场利率，再与同期农村 CPI 指数相减得到市场实际利率，作为控制变量。

6.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家庭的规模，户主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等人口学变量。其中，家庭规模以每个家庭的总人数衡量。

本文假设家庭的主要消费决策通常由户主做出，通过控制以上这些变量，可以控制消费者偏好的转变，也就是说，如果家庭的户主发生变化，则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同时，这些变量还隐含了一些预防性动机，比如户主的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可以考察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是

否会随年龄递减，从而可以看出户主有无为退休作提前储蓄的预防性动机。

表 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2 可以看出，农村家庭每三天花费在食品上的支出平均为 16.6 元，家庭年总支出平均为 3277 元，年净收入平均为 14156 元。农村家庭的总人数规模平均为 3.92；户主平均年龄 47.7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2 年，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全国 4.9 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的占 88%，文盲、半文盲的占 7%<sup>4</sup>。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数据集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可以据此考察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情况。

## 四、实证分析结果

表 4 中 (1)、(2) 列对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消费习惯形成模型进行估计, 2SLS 固定效应回归与系统广义矩估计均显示滞后一期消费的系数不显著, 表明农村家庭总消费不受习惯影响, 但由于总消费包括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 耐用品消费自身为消费者提供的跨期效用可能掩饰了消费者的习惯偏好。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影响非耐用品消费的因素, 以清晰地考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是否受到习惯的影响。国外文献如 Naik 和 Moore (1996) 等用食品消费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变量, 与先前以总量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内文献来说, CHNS 对家庭平均三年一次的观测和食品消费的非耐用性使得食品消费数据更适合进行习惯形成的研究, 同时为便于同国外同类研究相比较, 本文亦使用数据库中食品消费作为代理, 试图考察农村居民的耐用品消费习惯。

在实际生活的消费决策中, 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会影响家庭的食品消费, 我们可以用相对食品价格的变化来解释一部分对食品消费的影响, 但这项研究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因此在对食品消费习惯形成的检验中没有加入相对价格, 同此前国内外学者的同类研究 (例 Heien and Durham, 1991; Naik and Moore, 1996) 一样, 本文假定相对价格不变。估计结果见表 3。

(3)、(4) 列估计显示, 农村家庭的滞后一期食品消费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农村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存在一定的习惯。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因素有很多, 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习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不确定性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农村居民储蓄表现出预防性动机,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农产品信息收集渠道不充分, 在以家庭为主的农业经济中, 农户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者, 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常常交织在一起, 当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价格不确定的情况下, 收入也不确定, 加之我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灾害损失率偏高, 农民面临着制度、市场、自然等多重不确定性 (余永定, 2000), 生活随时会受到各种外部冲击的影响。虽然近几年在国家免除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促进下,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农村消费状况得到改善, 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消费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但在 2006 年以前, 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几乎完全由自己承担, 与城市相比, 农民收入虽然较低, 但子女的高中及大学教育花费与城市居民子女负担水平相同, 种种因素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不得不慎之又慎。

## 五、结论

与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 本文利用中国的农村居民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农村居民总消费、非耐用品消费的因素, 并结合习惯形成假说对中国农村居民持续偏低的消费倾向进而持续偏高的储蓄率进行了细致分析。研究发现, 农村居民在总消费中不存在习惯, 在非耐用品消费上存在习惯形成, 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 农村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本文的实证分析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对影响农村居民总消费及非耐用品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时,时间段较短,仅用食品消费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随着CHNS2009年度调查数据的公布,对于习惯形成的研究将在随后进一步深入,以强化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研究结果同时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首先,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这一现象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消费、医疗费用等对农村居民造成的负担过重,因此一味的教育、医疗产业化改革不可取,应该体现一定的公益性,并从减免学费、增加奖助学金、扩大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覆盖面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力度。第二,居民消费中的习惯形成导致消费行为更加谨慎,意味着消费者追求的目标是保持消费长期稳定提高,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已从关注吃穿转变为住房、教育、医疗、私家车、旅游等,而要促使居民敢于放心消费,建立覆盖全民的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显得更为迫切。第三,农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地区差异,为此,政府应在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需要强力推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短缺的资源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配置,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村之间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差距,立足长远,实现居民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 参考文献

- [1]Abel, A. B., Asset Prices under Habit Formation and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80(2): 38-42.
- [2]Alessie, R. and A. Lusardi, Consumption, Saving and Habit Formation [J], *Economics letters*, 1997, 55:103-108.
- [3]Alessie, R. and F. Teppa, Saving and Habit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Dutch Panel Data [J], *Empirical Economics*, 2010, 38(2): 385-407.
- [4]Angelini, V., Consumption and Habit Formation When Time Horizon Is Finite [J], *Economics Letters*, 2009, 103(2): 113-116.
- [5]Blanciforte, L. and R. Greene, AIDS Incorporating Habits: An Analysis of Expenditures on Food and Aggregate Commodity Group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3, 65(3): 511-515.
- [6]Blundell, R., S. Bond and F. Windmeijer, Estimation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Improv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andard GMM Estimators [J],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2000, 1553-1591.
- [7]Brown, T. M., Habit Persistence and Lags in Consumer Behaviour [J], *Econometrica*, 1952, 20(3): 355-371.
- [8]Browning, M. and M. D. Collado, Habits and Heterogeneity in Demands: A Panel Data Analysis [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7, 22(3): 625-640.
- [9]Carrasco, R., J. M. Labeaga and J. D. Lopez-salido, Consumption and Habit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Economic Journal*, 2005, 115: 144-165.
- [10]Constantinides, G. M., Habit Formation: A Resolution of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3): 519-543.
- [11]Deaton, A., *Understanding Consump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2]Due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13]Dynan, K. E., Habit Formation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 391-406.
- [14]Ferson, W. and G. Constantinides, Habit Persistence and Durability in Aggregate Consump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1, 29: 199-240.
- [15]Guariglia, A. and M. Rossi, Consumption, Habit Formation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Evidence from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2, 541-619.
- [16]Heaton, J.,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ime-Nonseparable Preferences and Time Aggregation [J], *Econometrica*, 1993, 61(2): 353-385.
- [17]Heien, D. and C. Durham, A Test of the Habit Formation Hypothesis Using Household Data [J],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 73(2): 189-199.
- [18]Howe, H. , R. A. Pollak and T. J. Wales, Theory and Time Series Estimation of the Quadratic Expenditure System [J], *Econometrica*, 1979, 47(5): 1231-1247.
- [19]Kraay, A.,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0, 14(3): 545-570.
- [20]Kuijs, L.,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 [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5.
- [21]Meghir, C. and G. Weber, Intertemporal Nonseparability or Borrowing Restrictions? A Disaggregate Analysis Using a U.S. Consumption Panel [J], *Econometrica*, 1996, 64(5): 1151-1181.
- [22]Muellbauer, J., Habits, Rationality and Myopia in the Life-Cycle Consumption Function [J], *Annales d' Economie et de Statistique*, 1988, 947-970.
- [23]Naik, N. Y. and M. J. Moore, Habit Formation and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in Individual Food Consumption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78(2): 321-328.
- [24]Pollak, R. A., Habit Formation and Dynamic Demand Func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0, 78(4): 745-763.
- [25]Pollak, R. A. and T. J. Wales, Estimation of the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J], *Econometrica*, 1969, 37(4): 611-628.
- [26]Roodman, D., 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 [J],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2006.
- [27]Ryder, H. E. and G. M. Heal, Optimum Growth with Intertemporally Dependent Preference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3, 40(1): 1-31.
- [28]Seckin, A., *Essays on Consumption with Habits Formation*, Ottawa, Ontari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arleton University, 1999.
- [29]艾春荣、汪伟. 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11).
- [30]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04, (2).
- [31]杜海韬、邓翔. 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状态下的预防性储蓄研究——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5, (1).
- [32]高梦滔、毕岚岚、师慧丽. 流动性约束、持久收入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农村微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统计研究*, 2008, (6).
- [33]杭斌. 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J]. *经济研究*, 2009, (1).
- [34]杭斌、郭香俊. 基于习惯形成的预防性储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 2009, (3).
- [35]杭斌、申春兰. 习惯形成下的缓冲储备行为[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10).

- [36]雷钦礼. 财富积累、习惯、偏好改变、不确定性与家庭消费决策[J]. 经济学(季刊), 2009, (3).
- [37]刘建国. 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J]. 经济研究, 1999, (3).
- [38]刘文斌. 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制约[J]. 经济学动态, 2000, (9).
- [39]刘兆博、马树才. 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中国农民预防性储蓄研究[J]. 世界经济, 2007, (2).
- [40]龙志和、王晓辉、孙艳.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习惯形成实证分析[J]. 经济科学, 2002, (6).
- [41]龙志和、周浩明. 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0, (11).
- [42]罗楚亮.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 经济研究, 2004, (4).
- [43]施建淮、朱海婷. 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 1999—2003[J]. 经济研究, 2004, (10).
- [44]孙凤. 预防性储蓄理论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J]. 南开经济研究, 2001, (1).
- [45]孙凤、王玉华.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 统计研究, 2001, (4).
- [46]田岗. 我国农村居民高储蓄行为的实证分析——一个包含流动性约束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及检验[J]. 南开经济研究, 2004, (4).
- [47]田岗. 我国农村居民高储蓄行为的实证分析——一个包含流动性约束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及检验[J]. 南开经济研究, 2004, (4).
- [48]万广华、张茵、牛建高.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 2001, (11).
- [49]汪伟.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 经济学(季刊), 2010, (1).
- [50]叶海云. 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J]. 经济研究, 2000, (11).
- [51]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 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 (2).
- [52]余永定、李军. 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1).
- [53]袁志刚、冯俊. 居民储蓄与投资选择:金融资产发展的含义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 (1).
- [54]袁志刚、宋铮.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1999, (11).
- [55]赵霞、刘彦平. 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和居民个人消费信贷的实证研究[J]. 财贸经济, 2006, (11).
- [56]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中国国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 1999, (5).
- [57]周绍杰、张俊森、李宏彬.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 一个基于组群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09, (4).
- [58]朱春燕、臧旭恒. 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的新进展[J]. 经济研究, 2001, (1).
- [59]朱国林、范建勇、严燕. 中国的消费不振与收入分配: 理论和数据[J]. 经济研究, 2002, (5).

## **Habit Formation, Uncertainty and High Saving Rate of Rral Households: Investigation of Micro Panel Data**

Nan Jia, Liangliang Z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tests for the presence of habit formation using rural household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The results yield strong evidence of habit formation on nondurables consumption at the annual frequency. Education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is an important explanatory variable for rural households' nondurables consumption behavior , and the habit componen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rural households'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is robust to several changes in the estimation methods.

**Key Words:** Habit Formation; Saving Rate; Rural Households

**收稿日期:** 2010-05-25;

**作者简介:** 贾男、张亮亮 ,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

<sup>1</sup> 居民储蓄是指一定时期内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的剩余,它表现为各种(实物的和金融的)资产的持有。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持有约占中国居民储蓄的 75%,而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的比例约占 60%-70%(孙凤、王玉华, 2001)。

<sup>2</sup> 八大类食品包括谷物类、食用油和调味品、蔬菜水果、肉、禽、奶制品、鱼、豆制品,本文剔除了样本过少的食品种类,比如婴儿配方奶、炼乳、高粱等。食品价格均采用自由市场价格。

<sup>3</sup> 家庭用具由交通工具、农用机械和家庭商业用具(炊具、缝纫机、五金小工具等)三部分组成。

<sup>4</sup>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166 页